

国际南社学会 南社丛书 总主编：柳无忌
第一套 主 编：柳无忌 高 钰 杨玉峰

苏曼殊传论

人
书

南
社

毛
策
著

国际南社学会

南社丛书 总主编：柳无忌

第一套 主编：柳无忌 高 铨

杨玉峰

苏曼殊传论

毛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曼殊传论/毛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3

ISBN 7-300-02011-9/I · 126

I. 苏…

II. 毛…

III. ①苏曼殊 (1884~1918) - 传记 ②苏曼殊 (1884~1918) - 文学评论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773 号

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总主编: 柳无忌

第一套主编: 柳无忌 高铨 杨玉峰

苏曼殊传论

毛 策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3 000 册数: 1-2 000

定价: 6.70 元

总 序

柳无忌

20 世纪初叶崛起大江南北、文人汇集、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其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载，却仍能号召着国内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士，纷纷在各地发起南社研究，自北京至南京，包括南社发源地的江、浙、上海，乃至广东，以及香港、台湾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远达美、欧、澳三洲。这些南社爱好者先后在海外与国内组织了南社学会，^①联合起来，以探讨和评介南社对于近代中国文学与民主革命的贡献，并扩大了南社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门新兴的南学。可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在兵马荒乱之际，除少数以外，南社作家的诗文遗著正在逐渐散失，他们的声名几将湮没无闻。因此，我们认为发扬南学有两件应做的工作：（一）我们要抢救现尚幸存的各种南社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印行问世，给予今日和来日的南社研究者以文献有征的便利；（二）我们将尽力为南学的成果培植一个读者园地，使其灿烂的累累果实，得到游园者的欣赏和赞美。

为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国际南社学会拟订了一份“南社丛书”^②的出版计划。今日，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得到多数南学同志的支持与协助，我们高兴地盼望着这部丛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根据预定计划，《丛书》分若干套，每套 10 种，陆续印行。其

类别有三：（一）南社文献，亦即南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所遗憾的是，没有经济力量把柳亚子等编的《南社丛刻》22集与《新南社社刊》一册重印问世，亦未能复制胡朴安编的《南社丛选》12册。但作为学会的贡献，我们将在《丛书》内刊出以新颖的方式、按照作品的内容分类、选择120位社员的诗、词、文编成的一部篇幅浩瀚的《南社选集》。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最近得到了、并将首先刊行新发现的柳亚子手编《南社丛刻》第23集与24集的未刊稿钞本。我们拟重印南社唯一的小说集，加以增补校订；同时，我们已编出一册《南社诗话集》，以为此类著作的先声。（二）南社作家的诗、词、文遗著，包括南社发起人陈去病，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高吹万、姚石子，以及南社重要作家如林庚白、傅钝根、刘季平、沈眉若、沈颖若诸人。^③（三）有关南社的著作，从综合的南社研究以至个别的社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以南社的历史为研究中心，在《丛书》内即将刊出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南社史长编》。此后的研究对象可扩大为南社与近代文学的关系，它对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部份的贡献，以及南社作家的评传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等。这些南学的重要课题，亟待研讨，期待其早日完成。作为南学的引导，让更多读者了解南社人物的阵容，《丛书》将推出百人以上的《南社人物传》，并辅以百绝句的《南社人物吟评》。虽然出版界已有好几种有关苏曼殊与柳亚子的书籍，但是对于他们的专题研究而有特殊成绩的作品，仍将列入《丛书》之内。因此，除了印行《吴梅评传》外，我们亦拟刊出《苏曼殊传论》，《苏曼殊资料集》，《柳亚子诗歌初探》等著作。

上列各书将于正在编辑的第一套、第二套《丛书》内陆续出版。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尚须继续努力，完成这个重印并创造南社文献的巨大计划。为争取时间，各书的付排，拟依照稿件收到的次序以定先后。这两套《丛书》亦将同时在两家出版社^④分别印行，俾得早日呈献读者之前，迎接此后其他各套丛书的问世。我

们希望这份工作能有所成就；更欢迎研究南社的学人和社团与我们携手合作——南学的前途无量！

1992年5月

写于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

注释：

① 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于1989年5月4日，秘书处设在香港；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1990年11月13日在北京成立。南京与上海都在筹组南社研究会，广东南社研究会最近即可成立。

② 此后在本文内简作《丛书》。

③ 柳亚子与苏曼殊的著作已有多种全集、文集、诗词集、选集等印行流传。

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代 序

马以君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以文艺家姿态出现的民主革命志士。从革命的角度说，他意志坚定，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为推翻清朝统治和袁世凯帝制尽心尽力；从创作的角度说，他多才多艺，以风格独特的诗歌、小说、散文、翻译、绘画树帜文坛，赢得生前和身后无数读者的击节和喝彩。但基于他是个“独行之士”，具有“不从流俗”的特异品格，所以不少人好把他当作“箭垛”，或则美化他、神化他，或则凭藉他、利用他，有意无意地将许多与他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趣闻轶事移植或附会到他的身上，使得这个本来已是令人费解的人物变成更难猜透的谜团。因此，苏曼殊所获得的桂冠大体停留在不大反映本质的“诗僧”、“情僧”、“风流和尚”、“革命和尚”一类称号上。然而，随着曼殊故旧及广大研究者——尤其是柳氏父子——的不懈努力，提供并发现了大量颇能说明和解决问题的资料，使这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而不致再继续充当人们揣测的对象。现在应该是充分借助既有的资料全面、客观、深入地分析和评价这个人物，并确立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了。

苏曼殊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父亲苏杰生是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的买办，自与其首妾河合仙的胞妹河合若私通后，于

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三月，河合若返回家乡逗子樱山。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到六岁随嫡母黄氏回广东省香山县沥溪村（今属珠海市前山镇南溪乡）祖籍，翌年入村塾从宿儒苏若泉读书，初步打下中国文化的基础。13岁因不堪忍受家人的虐待，转至上海学习中英文。15岁遵父嘱随表兄林紫垣到横滨大同学校就读。尝自感身世，潜回广东出家。重返横滨后，常出入于河合仙处，并与表亲“静子”发生了一段恋情。19岁至东京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在“总角同窗”冯自由（懋龙）的启发下加入进步团体青年会，开始了革命活动。第二年转入振武（成城）学校习初等陆军技术，并参加拒俄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因行动为林紫垣发现断去经济供给，而被迫辍学回国，准备投身正在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

曼殊回国的首途是苏州，经同行的吴绛章兄弟介绍，在吴中公学社任英文、体操教员。其后得知陈仲甫（独秀）在上海国民日报社主笔政，即转至该社任英文翻译，发表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诗歌、小说和散文，迈开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不久，从章行严（士钊）口中获悉故友黄兴在长沙酝酿革命，即行溯江前往寻访，先后借在明德学堂、经正学堂、湖南实业学堂、安徽旅湘公学任教为名，暗中参与华兴会的筹建工作。继而奉派至香港联络兴中会，共商革命斗争的开展。随后流浪到惠州再度披剃。回香港后，得师友资助，漫游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国，从中领略佛教活动的情况，并接受第三次戒剃。回国后经上海再至长沙，继续以教学作掩护，参与华兴会的举事密谋。事泄后转至上海参加秘密会议，旋以僧人面目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应好友刘三（季平）之邀，赴南京江南陆军小学堂任教，重晤伍仲文并结识赵伯先。不到半年又至长沙，参加武装起义谋划。接着偕陈独秀赴日本东京，于寻访河合仙的同时，顺向同盟会总部汇报请示，获派回芜湖做革命秘密工作。湘赣起义失败后，即

随陶成章、龚微生避地杭州，参加光复会领导的革命斗争。遭缉捕时转回上海，寓同盟会驻沪总部。其间曾“手持寒锡”到温州执行革命任务。

1907年，曼殊赴日本，转而从事文化活动，在《民报》、《天义》、《河南》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画幅，并致力于梵文和英文的译述，编出了《梵文典》、《文学因缘》等书稿。在此前后，参与国际性组织亚洲和亲会的创建和进步刊物《新生》的筹措工作。回国后，往来于上海、杭州之间，尝应杨仁山（文会）之召到南京祇垣精舍任英文教员，于弘扬佛学多所建树。

1909年，曼殊至东京，在痛感“极目神州余子尽”的同时，结识了日本艺伎百助枫子。在相处和别后的日子里，为她写出和译下大量情真意切的诗篇。在此期间，继续翻译拜伦、陀露哆等东西方诗人的名篇佳什。回国后，因刘师培夫妇变节事遭雷昭性的误会而自杭州转至上海。经陶成章推荐往爪哇噠嘛中华会馆学校任教，其中肩负着革命的发动和串连任务。1911年尝经香港、广州、上海赴日本探望河合仙并谋求《潮音》的出版。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爪哇，曼殊兴奋异常，急欲筹款返国服务。抵达上海，即参加心仪已久的南社，并应聘在太平洋报社任笔政，发表了好些小说和诗文。但面对辛亥革命弱点的逐渐暴露和胜利果实的惨遭葬送，他悲愤莫名，佯狂自戕，时去征歌逐色，寄情脂粉，以至在安庆教书、在苏州编辞典，都显得无精打采、意冷心灰。但曼殊毕竟是个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当他看透袁世凯窃国篡权的丑恶嘴脸时，即怒不可遏地写出声讨檄文。“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虽然被迫逃亡日本，但仍坚持结识革命党人，继续参与反袁斗争。先后在《民国》、《甲寅》、《南社》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文和小说。

1916年，曼殊回国不久，得知居觉生在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护国讨袁，即往青岛投奔。回上海后，住孙中山寓所。此后两度

至杭州，一度赴日本，除努力撰述、交结朋友外，于国事仍未忘怀，但此时，身体已日渐不济，虽多方料理，无奈病态沉痾，终于1918年5月2日逝世。

以上轮廓性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曼殊的一生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下不解之缘。只是由于他所从事的多属鲜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加上飘泊无定、形迹迷离的行踪，往往给人以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感觉。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欣赏的是他“哀感顽艳”的作品，同情的是他“落叶哀蝉”的身世。其实，苏曼殊是个亦僧亦俗、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文艺家。他的革命思想的形成，他的文艺成就的取得，都是基于一些独特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

作为内在因素，其关键之点在于苏曼殊具有良好的天份。

如上所述，苏曼殊是个私生的中日混血儿。按照生理学的观点，这种结晶品最易于融合父母的优良品质。苏曼殊天性纯真，不解忧幽之疾，患有轻度的神经分裂症，曾赤条条地闯进何震的房间，戟指洋油灯大骂；又曾月夜泛舟中禅寺湖，“歌已哭，哭复歌”；……这些异乎常人的举止，是精神高度亢奋的表现。这种精神亢奋，常常出现在与白痴相隔一层纸的天才身上。苏曼殊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他容易动情，“无端狂笑无端哭”，听到哀乐，就“袈裟湿透”；观看悲剧，就“泪淋淋下”；登高临远，就“放声恸哭”；凭吊古迹，就“潸然泪下”；思念朋友，就“涕泗横流”；与人握别，就“泪沾衣襟”。至于激愤之时，拍案而起，口诛笔伐；兴奋之时，手舞足蹈，乐极忘形，更是他极度情绪化的表现。而这种离开理智的感情全副投入，正是成就天才艺术家的重要条件。

对于苏曼殊，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绘画是精妙绝伦的，他的翻译是开时代先河的，他的运用古典是天衣无缝的。可是，直到如今，谁也没有提到过他如何学绘画，谁也没有指出过他读过哪些典籍。即使是十数万字的年谱或评传，在这些关节眼上，不是

以假设替代，就是一笔带过。相反，人们对他青年时代的资质，倒认为是“品性鲁钝”，“粥粥无能”。这就难免叫人觉得奇怪：怎么一个如此平庸的人物，仅十余年的光景就能成为一个如此出色的文艺家呢？这问题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苏曼殊的知识和本领，不是如常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而是发端于一种超人的悟性，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和机缘内，靠迸发出来的一股巨大的适应性和接受力，取得近乎“无师自通”的效果的。

先以诗歌创作来看，据陈独秀和章士钊介绍，20岁时的苏曼殊，不要说做诗，就是连写字也缺笔少画。然而经他俩略为点拨，未逮四年，就发现其作品“出语殊妙”，浑然天成。其实在此前的两年，曼殊已写出《住西湖白云禅院》那样情景交融，寓意深刻的佳作来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曼殊26岁时写的《本事诗》。这组诗，包括陈独秀、柳亚子、高天梅、蔡哲夫在内的当时著名诗人都和作。但一经比较，曼殊的10首明显技高一筹。造成这现象，恐怕不是拿一般的“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等理由所能回答得了的。因为曼殊长期“经钵飘零，尘落行脚”，一生留下的诗篇不过百余，他做诗的劲头显然远逊于其他诗人。所以他的“畏友”陈独秀就毫不掩饰地称赞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

那么，是什么原因能令曼殊做出这样的好诗来呢？看来归根结底是他善于借助“诗兴”。曼殊做诗，不像雕章镂句之辈“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凭着创作的冲动，灵感的触发去进行的。如他与伍仲文游同泰寺，目睹优美的湖光山色，就抑制不住地说：“动我诗兴矣”，于是“应声得句”。又如他在韬光庵夜闻鹃声，即联想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就邀请义士刘三前来共赋忧国伤时的诗篇。再如他赴淀江省母，看到农家欢快的春耕场面，就情不自禁地产生“桃花红欲上吟鞭”的兴致来。同样，曼殊对别人的创作也多从“诗肠饶几许”的角度去了解和审察。可见，“诗兴”在艺

术创作中的作用，他是十分重视的。

再以小说创作来看，苏曼殊于1903年译著出《惨社会》的前六回多，1911年创作出《断鸿零雁记》的前二十章，其间相距七八个年头。但前者“乱添乱造”、“殊不成句”；后者却精美无匹，达到民初中篇小说的峰颠。面对着这优劣殊异的作品，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如果曼殊是个职业小说家，那么多问题还可以通过“熟能生巧”的常理去解答。然而在这过程中，他只写过一篇《娑逻海滨遁迹记》，这就说明他不是个“耘而不辍”的笔耕者。像这样一个长期“离绝文字”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神速的飞跃，不能不说是同作者具有特强的领悟力密不可分的。其余小说，虽然逊色于《断鸿零雁记》，但与同辈人的作品相比，仍属上乘之作。曼殊以有数的几篇小说而能卓立于文坛之上，显然，他在才情方面是有许多过人之处的。

如果说，仅从诗歌和小说的创作还不足以看清苏曼殊天才发挥的轨迹，那么，透过美术创作就容易感受到他的天份的表现了。

曼殊四岁“伏地绘师（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六岁画所乘轮船，维妙维肖；七八岁在村塾绘鸟兽虫鱼，“卷卷笔生”；十五六岁在大同学校间作小品，“下笔挺秀”；十七八岁为教科书绘插图，兼教美术；二十岁以后，从现存的画幅来看，多是萧疏淡雅，韵味浓郁，运笔精妙，图意新颖的佳作。曼殊不仅在绘事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于画论也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散见于他的《画跋》、《画谱·自序》和《断鸿零雁记》。如评西村澄的《耶马溪夕照图》就说：“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诚为空谷之音也”。按照具有这样绘画技巧和理论修养的人，理应是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但据最了解曼殊青年时代的林紫垣说：他虽“善画”，却“未尝入美术学校”。与此说互异的当然也有，如曼殊在《潮音·跋》就自谓“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罗孝明亦说他“师事”过画家乌目山僧黄宗仰。但这些

都无从证实。即使属实，曼殊也说所学“一无所成”，罗孝明也说两人“风格迥异”。由此可知，曼殊“精妙奇特”的绘画本领的获得应另有来头，据他侄儿绍贤说他“具有夙根”。这一说法虽属常人对禀赋高超者的才华发挥的直观感受，但也确实反映出天才人物的某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其实曼殊何止在美术上“具有夙根”，在文学上同样“具有夙根”，只不过美术是以临摹为基础，当掌握线条的一些要领以后即可摹描物体，所以容易显示出“夙根”来；而文学一入手就强调创造，否则就是抄袭或模仿，所以“夙根”没那么容易显现罢了。

对于自己的非凡天份，苏曼殊似乎也有所觉察。他尝自认是“天生情种”。正是这“天生情种”，凭藉着丰富而充沛的感情，涉足于文艺的多个领域，一经点化，茅塞大开，迅速掌握艺术规律，创作出不同凡响的作品。本来，曼殊并不以文艺理论见长，但他对艺术的体味却相当透彻。他认为，诗歌应讲究“节族气体”，小说应体现“微词正义”，翻译应做到“辞气相副”，戏剧应注意“导世诱民”。这些近乎一语中的的言辞，道出了各种体裁的特征和要谛，若非具很好的天赋，是难以有如此深刻的领会的。由此，他的“知己”刘三比之为晋代的天才顾恺之，称之为“擅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好友柳亚子誉之为“举世公认的天才”。这些，看来都不为过份。

当然，任何天才如得不到适宜的环境造就也会被埋没的。苏曼殊所处的家庭和社会正为他的思想成长和艺术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苏曼殊生长在一个“重宗法”的封建家庭。他自小失去生母之爱，父亲又“颇形懦弱”，惧怕妻妾，对他甚少疼惜。而家人、族人出于一种“正统”的观念，把他目为“异类”，称作“杂种”。在这样的家庭里，曼殊备受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折磨：婶婶的白眼，庶母的刻治，姐姐的欺凌，甚至病未危而被抬进柴房待毙……面

对着这一张张凶狠的嘴脸，一个个残忍的行为，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无力反抗，只可把愤恨埋藏在心底，他默默地忍受着人间无情的痛苦，感受着世态炎凉的丑恶，渐渐地形成了内向的性格。他沉默寡言，孤独好思，时时剖析着周围的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真与伪。以致后来常常慨叹：“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每一念及，伤心无极”。

曼殊心头长期积郁着痛苦，这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极大的不幸，他时时自我作践，暴饮暴食，狂吸雪茄，有病不治，“以求速死”。这固然有对现实不满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有伤感身世的成份。为了弥补失去家庭温暖的空虚，他经常远涉重洋，投向义母河合仙的怀抱，甚至在爪哇也认黄水淇的母亲为干娘，从中寻求慰藉。所以他特别羡慕别人有母有家的幸福，尝写出“范滂有母终须养，张俭飘零岂是归”的诗句。然而曼殊的这一隐忧，从成就他为一个杰出的文艺家的角度来说，却是大幸。因为这样的家庭，这样的遭遇，有利于他感情的调动，可以引发他深思，促成他早熟，从而使他小小年纪就能通过领略人际关系的微妙，经受“惨绝人寰”的痛苦，促成他长大后在客观情势的触发下，写出有血有肉，有神有态的作品。试看他那向为人称颂的表现如同自己身世凄凉的下层妓女悲惨生活的诗作，就不难感受到他所流露的已不是一般有良心的嫖客的怜香惜玉之情，而是设身处地，与她们同哀伤，共悲叹，无分彼此，浑成一体怨恨了。要不是饱受无家无母之苦的人，能产生这样强烈的共鸣来吗？又如当他看到上海城隍庙开辟商场时，所关心的是“卖糖粥的从此没有生路了”，“小贩生活将绝了”等事情。这在趋炎附势、爱富嫌贫的世道里，要不是历尽辛酸的人，能产生这样感同身受的同情心来吗？

如果说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它对文艺家的功效往往限于小感情的触发；那么社会应是文艺家活动的大环境，是文艺家施展身手的大舞台。

苏曼殊所处的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社会，国内外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派系矛盾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瓜分，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导致整个局势空前动荡，斗争空前激烈。置身于这样一个变幻莫测、胜负难卜的社会里，不同利益的人会以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对待。苏曼殊缘于自身很强的可塑性和高度的正义感，在民主革命气氛的熏陶下，意识到不合理的制度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衰老的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挽救，因而他毅然投身到时代的洪流，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努力推动革命事业的进程。他的行为，孙中山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为什么苏曼殊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选择上革命的道路，并自觉地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呢？这有其具体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首先是生活困窘。苏曼殊的经济一向拮据，少年时代自不待说，即以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期间也比一般人困难得多。如 14 岁在上海，庶母竟将棉套拿去，剩下棉胎让他作被，使他冬天十分难熬；又如 19 岁在东京，表哥每月供给 10 元，令他只能住牛込区榎本町下宿屋，饭伴白灰，夜不燃灯。这样凄清的生活，孕育了他“穷则思变”的朴素阶级感情。导致他毫不犹豫地加入“死籍”的拒俄义勇队，并慨然从阮囊中掏出超乎义务捐款数倍的钱钞交给军国民教育会。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标志着他反帝反清的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以后，尽管他连“剃头洗身之费俱无”，靠告贷度日及支付路费，但他仍时时关注着心目中的革命事业的开展，这些都说明他对革命是一往情深的。

其次是离开家庭。苏曼殊孑然一身，不受束缚。这决定了他比一般身受家庭牵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态度来得坚决，来得激烈，来得无畏。据统计，清朝末年一系列重要的革命

组织他差不多都列籍其间，或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按现有材料表明，他的革命活动相当连贯，表现十分积极，有时简直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这是各怀心事、患得患失，或“借革命以营私”的人所无可企及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固然同他对革命的认识有关，但与他“无家一身轻”的状况也分不开。不妨设想，假如苏曼殊继承父业，四出经商，或者在家乡耕稼樵渔，满足于娶妻生子，自给自足之乐，是绝不可能有这样宽阔的胸襟和激进的行动的。

再次是交际广泛。苏曼殊自称“奢豪好客，肝胆照人”，所以朋友甚多，内中不乏富于进取的志士，如冯自由、刘季平、陈独秀、黎仲实、钮永建、陈天华、黄兴、朱执信、秦毓蓁、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陶成章、龚微生、赵伯先、张云雷、魏兰、罗黑芷、汪东、叶澜、陈陶怡、居觉生、章太炎、黄侃、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高吹万、朱少屏、叶楚傖、马君武、包天笑、朱梁任、黄晦闻、邓秋枚、马小进、蔡哲夫、诸宗元、李晓暾、章士钊、蔡元培、沈尹默、徐忍茹、田梓琴、邓孟硕、邵元冲、萧纫秋、陈其美、陈果夫、宋教仁、杨庶堪、胡汉民、蒋介石、程演生、刘师培、何震、周豫才、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蕤、陈树人、郑桐荪、马一浮、刘半农，以及佛莱蔗、钵罗罕、宫崎寅藏等。用柳无忌的话来说：如果把苏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的脑筋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在这些友人中，我们可以寻到许多于中国文学上、政治上都有永久影响的人，是的，他们于现今及以往的历史上皆能占有一页地位”。苏曼殊凭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在这些朋友不同程度的引导和影响下，从一个在维新派学校受教育的学生，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的征途，并伴随着写出不少有益于革命的作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觉醒的民主革命者和杰出的进步文艺家之一，决不是偶然的。郑桐荪说：他早年对革命“极热心”，相信“中国革命迟

早要成功”。这里说的侧重点虽属“早年”，但“二次革命”后，曼殊的反袁情绪同样激烈。

作为民主革命者，苏曼殊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其基点在于维护祖国的尊严，这是他每时每刻用以自警自律的。

本来，按照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东海飘零二十年”，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并不比在中国少，在日本获得的亲缘之爱更比在中国多。但在感情的表露上，他对中国却比对日本深厚得多。即以国籍而论，虽在《断鸿零雁记》和《潮音·跋》中，他曾自称是日本人，但在《秋瑾遗诗·序》和《南社入社书》中，他却明确写上籍贯是广东香山。这前后不一的矛盾，既表明他这个“相子”（混血儿）的内心的困惑和失衡，也体现了他藉此隐蔽身份以避免敌人的苦衷。所以他在朋友面前对此往往避而不答。然而，在更多的场合，他却毫不含糊地坚认自己是中国人。这可以从两个事例去说明。一是在上海龙华，一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曼殊用流利的英语进行驳斥，那外国人以为他是日本人，曼殊予以坚决的否定；二是在噶嘏赴望引的汽车上，一荷兰人见他有“扶桑老博士之风”，便问他可是日本人，曼殊以中国人作答。看来，苏曼殊如此肯定自己是中国人，恐怕除了受中国传统的“子随父籍”的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因为他感觉到富有人类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更值得亲近和骄傲，要不然他何以在《断鸿零雁记》中写上“携尔托根上国，……使尔离绝岛民根性，冀尔长进为人中龙也”一段话呢？当然，曼殊对中国的老大积弱是十分痛心的。一次，他在东京，一日本人从头上摸出一虱，说是从曼殊身上跳过去的。曼殊虽以“余之虱自身上，色白；子之虱在头发，色黑；何强加余以过”为理由驳倒对方，但他马上又感慨地说：“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基于这些认识，苏曼殊参加拯救中国的革命斗争就是更自觉，更主动了。

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爱国主义是体现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